

# 中国公共图书馆的历史渊源

陈文彬 孙小童 迟斌

威海市图书馆

[摘要] 本文通过探索文献的出现及其主要的载体,进而引出我国古代四种藏书形式,通过有据可查的历史背景,梳理分析了我国早期“图书馆”称谓来源,并且总结归纳了当代国际和国内“图书馆”的重要历史记忆,展望了公共图书馆的美好未来。

[关键词] 文献;藏书;图书馆;公共图书馆

[DOI] 10.12252/j.issn.2096-6261.2020.02.1055

中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自中国大陆上有人类活动开始,我们的祖先就没有停下探索的步伐。图书馆的发展,浓缩了先人的智慧,在图书馆的世界里我们不仅感受到社会的进步,也能感受到文化服务带来的幸福感。

## 一、文献的出现

提到图书馆首先想到的是图书馆保存的文献资源,文献是图书馆建立的基础,文献的发展对图书馆事业产生重大影响。

文献一词的意义在当今和古代也有所不同。在古代,其“文”和“献”分别代表两种不同的含义,据现存有的资料记载,“文献”提法最早出现在春秋战国时期的《论语》,其内容原文为“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朱子集注》中解释“文,典籍也。献,贤也。”<sup>[1]</sup>因此在古代,“文献”一词为两层含义:一是文字记载的典籍,二是学识渊博的贤人。

古代由于书写工具的限制,大量知识通过贤人口耳相传,也就形成了文中所说的“献”,因此“献”也成了古代文献的重要组成部分。比如《论语》是在孔子去世后,由孔门弟子编辑整理孔子及其弟子言行而形成的,从《论语》的成书过程来看,孔子生前和其弟子主要是通过语言来传递知识,这也就是古代提到的“献”。

“文”在早期有陶文、金文、甲骨文、玉石刻辞、简策和帛书六种形态。《墨子·明鬼下》中记载:“又恐后世子孙不能知也,故书之竹帛,传遗后世子孙。咸恐其腐蠹绝灭,后世子孙不得而记,故琢之盘盂,镂之金石以重之。”<sup>[2]</sup>在《墨子》的记载的古代占卜中有“书之竹帛”“琢之盘盂”“镂之金石”以此传于后世子孙。此外,清光绪年间,金石学家王懿荣因生病服用药物中有“龙骨”一味药材,偶然发现甲骨文的存在,以此证实了早期文献的六种载体的存在。而后随着造纸术和印刷术的推广应用,文字典籍得到了空前的发展,中国的文献资源也进入了纸张一统天下的时代。

“文献”发展至今日,早期古代意义上的“献”已经不在文献范围之列,如今的“文献”广义上讲是指各种载体记录的所有资料,如文字记载、图像、录像、录音等,但不包括实物本身。根据“文献”的广义定义,我们可以从中看到其具有特定的历史性,也许将来的文献载体更多更丰富,但不论怎样变化,文献资源的价值和地位只会越来越重要。

## 二、中国古代早期藏书形式

出现了文献,相对应的文献收藏制度也就出现了。根据史料记载,我国在夏商时期就有了史官,史的本意是“使”,意为“神的使者”,其最早的职责是占卜和祭祀,同时也负责记事和保管典籍。秦汉时期,统治者为加强皇权,打压史官的权力,史官开始逐渐向修史过渡,史官主要的主要职责也变成了记录和编纂历史。史官的出现使文献的保存得以系统化,其记录和编纂的历史更是作为后来官府藏书主要来源。

提到官府藏书就要提一下我国古代的藏书制度,我国古代的藏书制度主要有官府藏书、书院藏书、观寺藏书、私家藏书

四种形式。

### (一) 官府藏书形式

官府藏书是以皇家藏书为主。据史料记载,西汉开国皇帝刘邦创立了天禄阁和石渠阁。这也是现在大多数学者认为的中国最早的国家级图书档案馆,是典型的官府藏书。据考证,天禄阁收藏大量秦代及先秦书籍资料;石渠阁主要存有前朝文书、律令、户籍等档案类资料等。天禄阁和石渠阁作为当时最权威的图书档案馆,收藏的文献成为后人重要的参考史料。

### (二) 书院藏书形式

唐代,书院教育走进人们生活。书院一般选址在风光秀丽之所,远离市井喧嚣,是讲学著书,教书育人的绝佳场所。例如,中国古代四大书院之一的岳麓书院,目前是湖南大学下设的二级学院,继续承担着育人育才的重任。自书院开设以来,藏书就是其重要的物质保障,藏书的来源主要有自行购买、政府赏赐、官民捐赠、内部著述等。书院藏书自宋代时期开始发达,明清时期到达顶峰,从某种意义上讲,书院藏书是中国古代最具特色的藏书方式。

### (三) 观寺藏书形式

观寺藏书是指寺院和道观的藏书,一般其收集者是僧尼和道士。佛教是外传宗教,史料记载,佛教从两汉时期开始由印度经西域传入中国,东汉明帝时,派遣蔡愔博士及弟子秦景等十人远征西域求法,使团抄写四十二章佛经并邀请摄摩腾、竺法兰二位高僧一同回到东汉,因路途遥远,经书及佛像皆由白马托运,故汉明帝特意建立佛寺——“白马寺”以此纪念,由摄摩腾、竺法兰二位高僧翻译出来的汉字版《四十二章经》也成了现存中国第一部汉译佛典;到唐代时期,寺院数量已经林立天下,寺院的藏经也已非常丰富;两宋时期是我国寺院发展的蓬勃时期;元明清时,寺院及寺院藏书也都有或多或少的发展。<sup>[3]</sup>道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其思想渊源可追溯到三皇五帝时期,著名学术家南怀瑾先生认为:道教大概是东汉明帝时期创立,北魏时代定型,其创立起因只要是受外来佛教影响,诸道士秉承本土宗教,不甘示弱,勇气直追,因此创立道教;<sup>[4]</sup>道教自成立以来,便注重修建道教宫庙,一般成称为“观”、“庙”或者“宫”,道教人士自己抄写、印刷的藏书也大都存储其内,比如,现存的四川成都青羊宫保存的《道藏辑要》等。

### (四) 私家藏书形式

私家藏书,简言之就是私人藏书。开始于春秋战国时期,此时的藏书多以官府藏书为主,文献中有据可查的私人藏书第一人是孔子。魏晋南北朝时期,“蔡侯纸”已经得到普及,纸的应用给藏书家提供了丰富资源,抄书在一时间成为了藏书家的“时髦”方式,他们靠抄书来丰富自己的藏书资源。宋代开始,印刷术开始应用,随着雕版印刷术和活字印刷术的推广,图书的成书效率大大提高,藏书家的人数也从宋代开始大量增加。明清时期,私人藏书进入鼎盛时代,藏书的规模和品味也达到私人藏书新的高度,明清时期的文人志士搭建草堂,筑建高楼,做为特定的藏书楼使用,并将之赋以雅号“××

楼”“××阁”等。私人藏书楼保存至今也大多以图书馆、博物馆等形式保存。

### 三、中国图书馆称谓来源

古代中国的藏书形式多以官府藏书、书院藏书、观寺藏书、私家藏书四种方式存在，大多称为“××楼”“××阁”“××斋”“××寺”“××院”等，“图书馆”一词可以说在中国古代是完全陌生的词汇。

查询资料发现，中文“图书馆”一词的直接来源出自日语的“図書館”，日语“図書館”的名称首先来自1877年的东京大学法理文学部图书馆。<sup>[5]</sup>1958年语言学家王立达研究表明“图书馆”是日本人用“意译法”译出来的外国语词汇，在汉字读法上只有“音读”，不用“训读”。<sup>[6]</sup>并且日本著名学者实藤惠秀在《中国人留学日本史》一书中证实中文“图书馆”一词源自日语。<sup>[7]</sup>

中国的“图书馆”词汇来源虽被认为出自日本，可具体来源却饱受争议。有学者认为在傅云龙著写的《游历日本图经余记》中最早出现；有学者认为在梁启超主编的《时务报》中最早出现，但是不论是哪一种观点都离不开日本影响。

笔者比较赞成“图书馆”出自《游历日本图经余记》一说。按时间排序：《时务报》创刊时间为1896年8月9日，停刊时间为1898年8月8日，按最早时间估算的话，“图书馆”在《时务报》中出现的时间不会早于1896年；刊登在《教育世界》文章《拟设简便图书馆说》时间为1894年；傅云龙著写的《游历日本图经余记》大概时间为访日期间（1887年~1889年）撰写，并在《傅云龙日记》中有详细记载：“一八八七年十月十八日，傅云龙访问东京帝国大学，大学长渡边太一遣书记官永井久一郎导游大学……图书馆有元本《汉书》”<sup>[8]</sup>，此时明确注明时间为1887年，时间要早于前两者。

“图书馆”一词在官方文件中出现时已到1903年。图书馆业界专家吴晞老师在《图书馆史话》中提到：“图书馆”一词第一次被官方文件正式采用是1903年清政府颁发的高等教育纲领——《奏定大学堂章程》。《章程》颁布后，原京师大学堂藏书楼改名为京师大学堂图书馆，京师大学堂图书馆成为我国第一个采用图书馆名称的官方藏书机构。<sup>[9]</sup>1905年我国第一所官办湖南图书馆创立，这成为我国历史上第一个以图书馆命名的官办公共图书馆，随后湖北图书馆和福建图书馆也相继成立，图书馆名称开始在社会上流行。1909年，现国家图书馆前身，京师图书馆开始筹建，1910年清政府颁发了《京师图书馆及各省图书馆通行章程》，从法律层面对全国图书馆的建设给予规定，于此，图书馆的名号终于可以“名正言顺”。<sup>[10]</sup>

### 四、现代中国公共图书馆

中国的“图书馆”受西方影响巨大。随着西方社会的进步，新的图书馆形式出现并发展，图书馆开始向公共化演变。西方新型公共图书馆出现了公益性和公共性的特征，这在本质上区别于旧时期的图书馆。公益性和公共性特征的出现，标志着新型公共图书馆已经具备了现代图书馆的意义。

随着西方新型公共图书馆的出现和发展，许多权威机构和组织也开始对新型公共图书馆做出规范性要求。

194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了《公共图书馆宣言》，重点向世人阐明了三个观念：公共图书馆是现代民主政治的产物，也是民主制度的保障和民主信念的典范；要立法保障公共图书馆事业发展，完全或主要由公费支持；对社区所有成员实行平等的服务，全部免费开放。<sup>[11]</sup>《宣言》给图书馆人指明了三大使命：教育、文化和信息使命。<sup>[12]</sup>《宣言》正式表达了世界文化知识界和图书馆界对公共图书馆的基本立场，为世界各地的公共图书馆确立了基本使命。

1975年，国际图联（IFLA）进一步确定了公共图书馆四大职能：保存人类文化遗产、开展社会教育、传递科学情报、开发智力资源。在四大职能中，保存人类文化遗产的职能居于首位，由此可以看出，文化职能在图书馆界的重要性。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图书馆事业经过几次不同时期的发展。除“文化大革命”影响我国图书馆数量减少以外，其余时期，我国公共图书馆的数量和资金投入均有不同程度的发展。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各级图书馆业务方向和服务内容更加明确，图书馆学会、图书馆专业讨论会等核心组织和高标准会议相继成立和举办，中国公共图书馆的事业可谓是蒸蒸日上。<sup>[13]</sup>

20世纪末期，文化部推动图书馆信息化建设，将自动化集成系统作为国家重点科技项目下达，信息化图书馆在全国各地开始兴起。使用信息化办公后，效率明显提高，图书馆的借阅方式也由以往的闭架式借阅向开架式借阅进化。

21世纪，我国各级各类图书馆新馆的建设工作进入高峰期。新馆的建设不仅从建筑形式和设计理念上更加时尚和多元，在科技投入和服务模式上也进一步优化和升级，总分馆体系建设已深入各地，“全民阅读”活动也越来越受欢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逐渐完善。

目前，智慧化图书馆和数字化图书馆建设刚刚开始起步，南北方、东西部的各级图书馆差距还很明显，笔者揣测，图书馆将来的工作重点和工作任务将在其智慧化和数字化上加大力度，在拉近南北方和东西部图书馆之间的差距上不断努力。

### 参考文献：

- [1] 朱熹. 论语·大学·中庸[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3, 39-40
  - [2] 李小龙. 墨子[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6, 131-132
  - [3] 徐寿芝. 古代寺观藏书及整理[J]. 图书馆理论与实践. 2003(6): 93-95.
  - [4] 南怀瑾. 中国道教发展史略述[M].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6, 18.
  - [5] 顾焯青. 日语“図書館”词源考[J]. 大学图书馆学报. 2019(5): 109-120.
  - [6] 王立达. 现代汉语中从日本借来的词汇[J]. 中国语文. 1958(2): 90-94.
  - [7] 藤惠秀. 中国人留学日本史[M]. 谭汝谦. 林启彦, 译.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83: 333.
  - [8] 傅云龙. 傅云龙日记[M]. 杭州: 浙江古籍出版社, 2005, 80
  - [9] 吴晞. 图书馆史话[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5: 18-26.
  - [10] 周庆 项玉兰. 从启蒙、萌发到诞生[J]. 图书馆理论与实践. 2012(7): 85-87.
  - [11] 吴晞. 图书馆阅读推广基础理论[M]. 北京: 朝华出版社, 2015: 5-9.
  - [12] 柯平. 公共图书馆的使命[J]. 图书馆建设. 2019(11): 13-19.
  - [13] 柯平 胡娟 袁珍珍. 新中国成立70年我国图书馆事业变革: 路径、经验与问题[J]. 国家图书馆学刊. 2019(5): 41-50.
- 作者简介: 陈文彬, 出生年月: 1993年1月, 性别: 男, 民族: 汉族, 籍贯: 山东滨州, 研究方向: 公共图书馆。  
孙小童, 出生年月: 1987年2月, 性别: 女, 民族: 汉族, 籍贯: 山东威海, 研究方向: 公共图书馆。